

# 从鉴古思潮看《国语》之编纂目的及其叙述方式

## ——兼论《国语》与《左传》之关系

程水金

[摘要] 《国语》与《左传》之关系,前人之说纷纭。就先秦史官文化的发展趋势而论,《国语》是先秦鉴古思潮的产物,其编纂目的是搜缀既往,鉴于当时,或戒于将来。《左传》是依经作传的解经之作,产生于历史反思的学术潮流,担负着探索历史运演总规律的文化使命。二书编纂目的不同,其编排体例、文字风格及思想水平自亦不同。

[关键词] 国语;左传;尚书;左丘明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8)04-0473-06

### 一、《左传》、《国语》关系之旧说种种

《国语》的性质及其与《左传》之关系,是学术史上纷纭聚讼的问题。自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少卿书》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后,汉人便直目《国语》为《春秋外传》。如刘歆上哀帝奏议引用《国语·周语上》“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之礼,即云出自《春秋外传》<sup>[1]</sup>(卷73)。班氏父子亦从其说。班彪云:“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sup>[2]</sup>(卷40)班氏《艺文志》著录《国语》自注云“左丘明撰”,又于《律历志》“颛顼帝”及“帝誉”条下,分别引《国语》之说,而题作《春秋外传》。至于何以称“外传”,王充《论衡·案书篇》说“《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因此,“《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刘熙《释名·释典艺》说是“《春秋》以鲁为内,以诸国为外”,《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是“外国所传之事”,故曰外传。而三国时吴人韦昭《国语解·叙》则曰:“左丘明因圣言以摭意,托王义以流藻。其渊源深,沉懿雅丽,可谓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识高远,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乐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立于经,故号曰外传。”王充以《左传》辞略,复录《国语》以实之,有内外;刘熙以《左传》为鲁史,《国语》记诸国之事,以鲁而言内外;韦昭则以释经不释经为内外。后世言《外传》,不出此三家之说。

亦有以《国语》为《左传》之史料说。此说以司马光父子为首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83引巽岩李氏(李焘)曰:“昔左丘明将传《春秋》,乃先采集列国之史,国别为语,旋猎其英华作《春秋传》。而先所采之语,草稿具存,时人共传习之,号曰《国语》,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直峻健,甚者驳杂不类,如出他手。盖由当时列国之史,材有厚薄,学有浅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为此重复之书,何邪?先儒或谓《春秋传》先成,《国语》继作,误矣。惟本朝司马温公父子能识之。”近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认为,《汉书·艺文志》著录《新国语》54篇,乃是左丘明之原本,刘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sup>[3]</sup>(第87-88页)。康氏所云刘歆割裂《国语》以伪造《左传》之说,亦是以《国语》为《左传》之史料说之流亚。

又有《国语》与《左传》实为二书之说。晋人傅玄云：“《国语》非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sup>[4]</sup>（第 2171 页）唐人赵匡亦云：“《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序事又多乖刺，定非一人所为也。盖左氏广集诸国之史以释《春秋》，《传》成之后，盖其家子弟及门人，见嘉谋事迹多不入《传》，或有虽入《传》而复不同，故各随国经之而成此书，以广异闻耳。”<sup>[5]</sup>（第 9-10 页）

上述三说，皆古人遗意，自近代以来，言《国语》之作者及其与《左传》之关系者，无不各引一说而相非。至若卫聚贤以《国语》为左丘明之后代左人郢及其子孙作于楚国；郭沫若以《国语》之《楚语》乃左史倚相所作，其余则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均无真凭实据，难以信从<sup>[6]</sup>（第 179-197 页）。

我们认为，仅仅是在传统经学或史料学的视域考察《国语》的性质及其与《左传》的关系，似乎难以得到满意的结论。本文拟从先秦史官文化及史官散文发展演进的宏观视域，以编纂目的为切入点考察《国语》的性质，从而说明传统所谓“外传说”及“史料说”之不实。

## 二、先秦史官文化的发展趋势与东迁前后鉴古思潮的形成路径

先秦史官文化与史官散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互为蝉联的三个阶段：（1）传世与不朽的历史意念，导致了记事之史的分化，开创了中国古代“君举必书”的历史传统；（2）寻觅古鉴的现实动机，促进了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以史为鉴”，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3）历史反思的学术潮流，形成了中国早期的史学自觉，暗寓褒贬的《春秋》及阐释其“微言大义”的三《传》，基本确立了中国古代评判历史行为的价值准据。因此，从传世与不朽意念的产生，至于寻觅古鉴再至于既往历史进程的全面反思，这就是先秦史官文化及史官散文发展演进的宏观路径。

如果将研究视焦对准史官文化及史官散文发展的第二阶段，则不难发现，搜缀既往、寻觅古鉴这一文化阶段本身，亦经历了一个正一反一合的演变过程。最初是援例性的以事为鉴，今文《尚书》中的大部份篇章，由此而从尘封的王室档案之中流传出来，或者有些篇章竟是按“当下”的需要据传闻而改写亦未可知。援例性的以事为鉴，主要是在西周末年及东周初年的厉宣幽平之世。由文献比照研究的结果表明：传世的 29 篇今文《尚书》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均与厉宣幽平之世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如西周末年有所谓“周召共和”或“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尚书》之中 29 篇《周书》有 11 篇是西周初年周公旦、召公奭“夹辅周室”时的文诰。又，周平王东迁洛邑，是西周末年的重大政治事件，而《盘庚》一书又从殷人的“典册”之中翻检出来；此外，《召诰》《洛诰》似乎亦有为平王东迁洛邑作历史论证的意味。至于周宣王之“不籍千亩”与《尚书·无逸》的对应关系，以及“赫赫宗周，褒氏灭之”，周幽王时代的“艳妻煽方处”与《泰誓》《牧誓》之“牝鸡无晨，牝鸡之晨，唯家之索”的对应关系，更是不难索解的。

不可否认，援例性的以事为鉴，只是一种“形而下”的直观方式，没有超出“当下”与“历史”相互牵连比附的思维形式。随着鉴古思潮的发展，这种“形而下”的直观方式便为历史经验的抽象化与条理化的理鉴方式所取代。这便是今传《逸周书》大部分篇章搜集整理成文的文化动因。清人谢墉《刊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尝玩其文，与《尚书》周时诰誓诸篇绝异，而其宏深奥衍，包孕精微，断非秦汉人所能仿佛。”谢氏凭直觉感悟到《逸周书》与《尚书》中“周时诰誓诸篇绝异”，而以“宏深奥衍包孕精微”统言其精神，可以说把握了二书的不同之处及《逸周书》的基本特质。惜乎缺乏科学分析而失之于笼统。

《逸周书》已经超越了将“当下”与“历史”作简单的牵连对照和援例性的事实比附，而呈现出历史经验抽象化条理化的趋势，带有明显的理论色彩。抽象化与条理化的历史经验，具有格言与箴语的性质，因而具有超越具体历史时代的隽永。谢墉所言“宏深奥衍，包孕精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论的。因此，《逸周书》的行文方式具有明显的两大特点。其一，以纪数表条理；其二，集格言轨论而成文。

以纪数表条理，前人所论已有涉及。如清人朱右曾云：“愚观此书虽未必果出文武周召之手，要亦非战国秦汉人所能伪托。何者？庄生有言，圣人之法，以参为验，以稽为决，一二三四是也。周室之初，箕子陈畴，周官分职，皆以数纪，大致与此书相似。”<sup>[7]</sup>（第 1229 页）朱氏以纪数表条理作为《逸周书》的一大特点，并与《洪范》及《周礼》进行比较，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洪范》一文，是 20 篇今文《尚书》中唯一的

一篇政治哲学，其文体在《尚书》众多典谟诰誓之中亦属特别。其“洪范九畴”皆以数纪，行文风格与《逸周书》某些篇章极为相似，应该属于同时代的产物，“要亦非战国秦汉人所能伪托”，当属春秋末年或战国之初的作品。至于集格言轨论以成文，亦是《逸周书》的重要行文方式。如《史记解》、《周祝解》、《王佩解》、《芮良夫解》等，皆是其例。

由于《逸周书》已经超越了以事为鉴的直观方式，我们不能在事实上找到它们的“古”“今”对应关系。因此，以理为鉴的具体时代断限亦难于确定。但这个阶段必然在《尚书》大部分篇章流传之后。

### 三、《国语》以古为鉴的编纂目的

随着时代的推移，鉴古方式亦发生变化。如果说援例性的以事为鉴之后，必然继之以抽象化的离事而敷理的以理为鉴，那么其后续出现的鉴古方式必然是熔事理于一体的较高层次。《国语》的编纂成书，正是适应了这一较高层次的鉴古要求。

首先，《国语》所述前言往行，意在规诫世君人主及用事之臣。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便是事神保民。《尚书》中“天命不于常”的忧患意识，在这里演化为明确的秉国原则。《周语上》内史过之论神、民、君三边关系，是《国语》事神保民思想最为集中的阐发。照内史过的看法，世君人主处在民与神的夹缝之中，必须恭事神灵，惠爱庶民，二者不可偏废。当虢公使祝史请求神灵赐予土地时，内史过曰：

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神福焉，神必祸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亲也。今虢公动匮百姓以逞其违，离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难乎！

不享祀神灵而求多福，神灵必祸之；不慈保庶民而求役使之，民必叛之。果然，四年之后（惠王十九所）虢灭于晋，不幸被内史过所言中。

事神保民，作为一种基本的思想原则，贯穿于世君人主的一切政治生活。如《周语上》“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谏辞曰：“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不籍千亩”，则农事有废，农事之废，其直接后果便是祭祀之粢盛无所出，庶民生计亦因之受影响。因此，“王事唯农事是务”，“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然而，宣王并不采纳虢公之谏，结果“三十九所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韦昭注曰：“宣王不纳谏务农，无以事神使民，以致弱败之咎也。”此注深得《国语》编纂者之心。

当然，《国语》所载先贤遗训，对“德”的劝勉和表彰亦不遗余力，且比《尚书》中“德”的内涵更加系统而丰富；也比《逸周书》中抽象的“德”的诫条，更具体而深切。系统而丰富，则以鉴以戒者广；具体而深切，则鉴之戒之者易效。兹就其荦荦大者略举数端。

昭忠信。忠信乃人伦中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晋国大夫叔向曰：“忠自中而信自身，其为德也深矣，其为本也固矣。”（《晋语八》）忠信的适用范围相当广泛，君臣之间、与国家之间乃至于君主与臣民之间，均须忠信作为维系。如《周语上》：

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吕甥、卻芮相晋侯不敬，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以告王曰：“晋不亡，其君必无后，且吕、卻将不免。”

于是，内史过发了一通关于忠信的议论，认为“长众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礼不顺，非信不行”。可是晋惠公即位则“背外内之赂，虚其处者，弃其信也；不敬王命，弃其礼也；施其所恶，弃其忠也；以恶实心，弃其精也。四者皆弃，则远不至而近不和矣，将何以守国？”而作为臣子，对于君主的过失应随时匡谏，否则亦是不忠。但吕甥卻芮作为礼宾大臣对晋惠公的失礼行为不加谏阻，“大臣享其禄，弗谏而阿之，亦必及焉”。果然，“襄王三年而立晋侯，八年而隕于韩，十六年而晋人杀怀公。怀公无冑。秦人杀吕金（吕甥），子公（卻芮）。”内史过的预言终于符验。与晋惠公形成鲜明对照，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晋文公使“上卿逆于境”，又亲为郊劳，极尽人臣之礼。内史兴曰：“礼所以观忠信仁义”，“四者不失”，“艾人必丰”。此类忠信之训，《国语》所载甚夥，难以尽述。

尚宥事。“以小怨置大德”既不利于王延揽人才，也极易疏远人心，此乃人君之大忌。此类记载《国

语》亦多。如《齐语》录齐桓公释管仲射钩之怨以为相;《晋语》记晋文公赦寺人勃鞮斩祛之罪。遽见不出亡的守藏者坚头须皆是其例。而桓公用管仲卒霸诸侯;重耳纳寺人、头须,亦使自己幸免于难。至于一般人不以小怨置大德,亦不失为宽厚仁爱之君子。如《晋语九》“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即是其例。

崇气节。所谓气节,即所谓“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如《晋语九》载中行穆子伐狄围鼓,以鼓子苑支归献晋倾公,并令鼓人各安其位。但鼓子之臣夙沙釐携其妻子跟随鼓子为俘。穆子召问其故,则曰“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君有烈名,臣无叛质”。穆子叹而谓左右曰:“吾何德之务而有是臣也?”对夙沙釐充满钦敬之情。《晋语四》记重耳流亡于楚,楚成王问“若克复晋国,何以报我”,重耳答曰:“若以君之灵,得复晋国,晋楚治兵,会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囊鞬,以与君周旋!”其不畏强圉无亏大节的气概亦令千载之下钦慕不已。

《国语》中既有对“德”的正面劝勉,亦有对“不德”的反面惩戒。正面劝勉是“为后世法”,反面惩戒是“为后世诫”,二者相辅而行。兹亦举三事以明之:

### (一) 惩贪冒

贪冒者,既有贪势,亦有贪财,更有贪功。如晋惠公欲乘乱入国为君,不惜“尽国以赂外内,无爱虚以求入”,是贪势者。晋大夫里克、丕郑收受晋惠公贿赂则是贪财者,贪财与贪势总是狼狈为奸的。然无论贪势者抑或贪财者,均不得善终:里克、丕郑为晋惠公所杀;而惠公自己亦因背外内之赂,忘恩负义而“无后于晋”(《晋语三》)。至于晋国董叔则因贪图富贵而身受皮肉之苦,《晋语九》:

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他日,董祁诉于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

董叔不听叔向劝告,一心想高攀富贵,结果得罪妻子,被舅老爷吊在树上,真是求系得系,求援得援,吃了大亏。此外,《周语中》载“晋既克楚于鄆,使卻至告庆于周”,卻至向周大夫夸耀,鄆之战晋国获胜,全是他一人之功,单襄公云卻至“佻天之功以为己力”是“兵在其颈”。果然,归国后两年,为晋厉公所杀。

### (二) 戒淫侈

《国语》似乎对女宠祸国痛心疾首。女宠之起,与国君的淫欲密切相关。晋国自献公以至于重耳入国之前,内乱不已,皆因献公宠骊姬而杀太子申生所起。至于《晋语一》说夏桀宠妹喜而亡夏,殷纣宠妲己而亡殷,周幽王宠褒姒周于于是亡,“从政者不可以不戒”,则更是典型的女宠祸国论。

戒奢侈的文字,《国语》中更多。《鲁语上》“庄公丹桓公之楹而刻其桷”,匠师庆言“先君俭而君侈,令德替矣”。《周语中》刘康公聘于鲁,见鲁大夫俭侈不同,言侈者叔孙宣子、东门子家“若家不亡,身必不免”,“侈则不恤匱,匱而不恤,忧必及之”,此“亡之道也”。《楚语上》灵王为章华之台,伍举言“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则“楚其殆矣”!

### (三) 箴骄固

骄固之为德,与从谏如流不耻下问正相反对。其事例,《国语》所载亦多。最为典型的是《吴语》和《越语》。越王勾践为报会稽之恨,与民生聚,在危难时期,唯范蠡之谋是听。尤其《越语下》所记,勾践多年隐忍等待,复仇心切,屡欲兴兵讨吴,一次又一次地被范蠡所阻止,越王的耐心与从谏实在是罕有其匹。而吴王夫差则恰恰相反。骄固刚愎,自以为是,企图争霸中原,与齐晋角力。且又不虑越国之患,与勾践“行成”。深谋远虑的伍子胥屡屡进谏,他不但加不采纳,且勒令伍员自裁,并取其尸盛之于鸱鸢革囊投之于江,断绝了忠谏之路。最后终于腹背受敌,国破身亡。临死之前才若有所悟:“使死者无知,则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见员也!”《国语》编纂者对于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不同结局,有一句十分精当的评语:“越灭吴,上征上国,宋、郑、鲁、卫、陈、蔡执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谋故也。”其箴骄固以鉴于将来之意,是颇为明确的。

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一部《国语》所叙之事必取于国事民谏及人生大节,所述之言必主于惩戒劝勉砥砺警策。正如宋人黄东发在《黄氏日抄》中所言:“《国语》事必稽典型,言必主恭敬,国章之崇虐邪

说，一语无之，是足昭万世也。”可见，以先贤遗训鉴于当世、戒于将来，乃《国语》编纂目的之所在。

#### 四、《国语》以古为鉴的叙述方式

编纂目的决定着叙述方式；反之，叙述方式亦体现着编纂目的。因此，《国语》的叙述方式，仍然标志着搜缀既往寻觅古鉴的目的性。

第一，《国语》的文章结构，往往是先叙事由，次就事而议，最后交待事件的后果，而这后果的善恶，又与其议论的褒贬相吻合。如《周语上》“周厉王使卫巫监谤”一节，便是典型例证。文章首叙事由：“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次叙邵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谏说之辞。最后，交待事件的结局：“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这是典型的“事由—议论—后果”三段式。又《晋语一》“史苏论骊姬必乱晋国”亦是其例。首叙其事曰：

献公伐骊戎，克之，灭骊子，获骊姬以归，立为夫人。生奚齐；其娣生卓子。骊姬请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悬，重耳处蒲城，夷吾处屈，奚齐处绛，以徼无辱之故，公许之。

然后，接叙史苏上朝为诸大夫论析“乱生”之理。史苏之论，主要从三个方面说明骊姬必乱晋国的根据。一，史苏认为，献公灭骊子获骊姬以归，是“灭其父而蓄其子”，这是祸乱的根基。二，以骊姬为夫人，则“民之疾心皆至”，必然导致“上下有判（叛）”。三，骊姬生男，则是“天强其毒”。骊姬既为夫人必然为其子争正统。而骊姬危及太子与其他诸子的处置，献公又言听计从。因此，献公“灭其父而蓄其子”，又“从（纵）其欲”，必然“败国深乱”。最后，史苏总结三代以来女宠祸国的历史教训说：“乱必自女戎，三代皆然。”从历史规律指出骊姬乱晋的必然性。叙完史苏之论，作者出面交待事件的后果：

骊姬果作难，杀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难本矣。

作者用一“果”字，回应前文，突出强调其后果的逻辑必然性。可见本章整体结构亦是“事由—议论—后果”这种典型的三段式。

第二，与文章结构密切相关，《国语》的叙述，十分注重历史事件的内在因果逻辑。《国语》的编纂目的是追寻既往的历史经验为鉴于当世或垂法于将来。而实现“为鉴”或“垂法”的历史功能，必须依赖于事实的清晰明了与道理的透彻明白。《国语》用以规诫世君人主及用事之臣的所有训诫谏说之辞，都是在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叙述与论析之中阐发出来的。既不离事而言理，亦不舍言而空载事目。如前引《周语上》内史过论晋惠公君臣即是其例。为明析起见，不妨将内史过所论之因果略加绎述：内史过行毕策命之礼，归告襄王说，晋国倘不灭亡，则晋君必将无后于晋国。且吕、卻二人亦将不免于杀身之祸。襄王不知何故，于是内史过解释了一番理由。他说，“长众使民之道”，在于精、忠、礼、信；而晋侯即位，背内外之略，又不敬王命，故精忠礼信“四者皆弃”。“四者皆弃”，“则远不至而近不和”，不能“长众使民”，将无以守国。此其一也。且先王教民事君以敬，并以各种礼节仪式暗示与强固“敬”的心理，又用刀锯斧钺禁其非礼。而晋君非嫡嗣而即位，本应兢兢业业，谨慎戒惧，且即使如此，尚犹不足，岂可放肆妄为，陵民卑上。晋侯如此“诬王无民”，祸必速及。故此，晋国不亡，则晋侯必无后嗣于晋国。至于子金、子公二大臣，享其君禄，君主有失而弗知谏，且从而阿之，亦必及祸！果然，内史过的观察与推断，一一言中。晋惠公于周襄王三年即位，四年襄王赐瑞命。八年，秦晋战于韩原，晋军大败，惠公为秦人所俘。其子公子圉即位，是为怀公，晋怀公又为重耳杀之于高梁之虚，怀公没有子嗣，故绝后于晋国。吕甥与卻芮亦为秦人所杀。历史的因果必然性，昭然若揭。而内史过的一番推断，正是这种历史因果的逻辑论证！又，《论语》载臧文仲祭祀海鸟爰居，展禽指责他为政迂阔而不得要领。展禽所述，其理由有二：一是臧文仲不明祭祀之理。“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虞夏商周之所祀者，“皆有功烈于民者也。”今此海鸟，“无功而祀之”，则有违于国典，是为“非仁”。二是臧文仲不明物理。海鸟爰居集止于鲁东门之外，盖因此鸟能预感海之将有灾，故飞入内陆以避难。“是岁也，海多大风，各暖。”此鸟果因海上风暴及气候变化而迁居，证明展禽所言不差。

因此,展禽说臧文仲祭祀海鸟乃“不仁不智”之举,“不仁不智”,即是为政迁阔而不得要领的原因。再如《周语上》“邵公谏弭谤”一节,邵公所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在“卫巫监谤”与“流王于彘”之间,构成了无可选择亦无可回避的必然联系!

综上所述,今传 21 篇《国语》与《尚书》、《逸周书》的性质相同,是搜缀既往寻觅古鉴思想前提下的产物。所不同者,《尚书》的大部分篇章是援例性的以事为鉴,而《逸周书》则偏重于离事而敷理的以理为鉴。至于《国语》,则是事以析理,理由事发,具有事理昭彰的特点。准此,则《国语》与《左传》是编纂目的各不相同的两部书。《左传》是依经作传的解经之作,则亦是规模宏大的编年史,它产生于历史反思的学术潮流,全面反思既往历史进程,担负着探索历史运演总规律的文化使命。因此,《左传》的叙述宏肆,枝叶纷披,思想较《国语》为深刻。而《国语》是鉴古思潮的产物,其编纂目的是搜缀既往,鉴于当时,或戒于将来。故而行文体例乃是就事析理,且往往是一事一议,不枝不蔓,以期于事简而理明。二书编纂目的不同,其编排体例、文字风格及思想水平自亦不同<sup>[6]</sup>(第 179-197 页)。因此,我们认为,《国语》之与《左传》,既然是编纂目的各不相同的两部书,则前人所谓“外传说”或“史料说”,皆为无根之谈。

### [参 考 文 献]

- [1]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2]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1999 年版。  
 [3]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上》,北京:中华书局 1956 年版。  
 [4]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载阮刻本《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影印本。  
 [5] 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第五》,载《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6] 谭家健:《国语成书时代和作者考辨》,载《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7]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8] 程水金:《早期史官散文产生的文化背景述略》,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 年第 2 期。  
 [9] 程水金:《西周末年的鉴古思潮与今文〈尚书〉的流传背景》,载《汉学研究》2001 年第 1 期。  
 [10] 程水金:《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责任编辑 何坤翁)

## On the Aim and Narrative Style of Guoyu

Cheng Shuij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diverse opin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oyu and Zuozhuan. From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the culture of the official history-recorders, Guoyu is an outcome of a compiling effort in pre-Qin dynasty, by way of picking up useful materials from historical records to compose together as a book. The aim of this book is to make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Zuozhuan is an annotation of Spring and Autumn, so it relates the historical events by following the model of Spring and Autumn. The purpose of it i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route of history. Different in compiling aims, Guoyu and Zuozhuan, therefore, differ in compiling methods, literary style and thinking depths.

**Key words:** Guoyu; Zuozhuan; Shangshu; Zuo Qiuiming